

學位論文目錄

陳逸凡

收錄範圍涵蓋99學年度下學期至100學年度上學期通過論文考試，獲頒學位與台灣文學相關之碩博士論文（含在職專班、進修班），共收錄博士論文23筆，碩士論文386筆。本年度亦針對博士論文撰寫摘要，學位論文目錄則依學校、科系、作者筆畫排序列出。

博士論文摘要

新刻的石像——王文興與同世代現代主義作家及作品研究

洪珊慧，中央大學中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康來新

台灣戰後的現代主義文學風潮在1960年代興起，其成就在台灣文學發展歷程上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王文興是這一波現代主義文學風潮中重要的代表性人物。本論文以「世代」的概念，將王文興與同世代現代主義作家，如白先勇、歐陽子、陳若曦、郭松棻、王禎和等人的作品，作一對話參照，突顯他們在台灣現代小說發展里程中的創新與時代意義。

研究者探討台灣現代主義文學中「家與個人」的關係，在這個層面上現代主義作家企圖表現人性的複雜與多面性，挑戰傳統既定的社會道德與倫理秩序。在「現代與傳統」的關係上，研究者認為現代主義作家除了學習西方現代文學的精華與技巧之外，亦有深厚中國古典文學與藝術文化的根底。關於現代小說語言文字的思索與策略，現代主義作家反思現行的小說語言，並進行小說語言的精煉與再創造。他們嘗試跳脫一般語言文字的表現模式，不斷創新突破以達最佳藝

術效果。在現代主義與鄉土的關係上，他們對離散、城市與台灣的在地觀察，也為台灣文學留下深刻的印記。

王文興與同世代現代主義作家們，試圖在1960年代由官方長期掌控的封閉文學環境中，走出一條新的創作道路。他們將中文敘事語言的藝術推向新的境界，突破現有白話文的框架，創造出屬於他們那個世代特殊的小說美學。

閩台唸歌研究

吳姝嬭，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金榮華

本論文運用豐富的文獻和研究成果為基礎，並透過長時間的田野調查，深入探究說唱藝術「唸歌」的發展脈絡、文學內涵、社會功能、表演型態、說唱者經歷及唸歌當前的現況，對唸歌進行總體的研究和探討。

唸歌於清道光年間就已存在，盛行於閩南及台灣一帶。二百多年來，唸歌深入民眾的生活，不僅是人們重要的生活娛樂，同時更發揮勸善教化、新聞傳播、政治宣導、宗教宣揚、歷史傳述等種種社會功能。它的題材豐富，有民間故事、新聞、歷史、宗教、政治、禮俗、敘情等各類題材，傳統與現代並蓄，蘊含豐富的文化內涵。其表演型態亦

隨著時代變遷不斷改變，閩南和台灣因為文化和政治環境的差異，發展出各具特色的表演型態和內容。

本論文探討歷史的沿革和形式，並將唸歌分成愛情故事、公案故事、三國故事、孝順故事、神魔故事、宗教故事、新聞時事、台灣史歌、勸世歌謠、敘情歌謠共十大類。研究者肯定唸歌的語言資料、文學價值及社會功能，並針對唸歌的唱本、出版者、作者以及說唱者進行深入的探究。研究者將唸歌的說唱型態分為走唱、歌仔館、賣藥團、電台說唱、視聽說唱等型態，最後以說明唸歌的現況作結。

歷史的謊言·鄉土的真實——李喬小說創作研究

黃小民，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李進益、嚴紀華

本論文討論主題包含李喬的創作生平、短篇與長篇小說呈現的主題思想、以及作品中所使用的特殊技巧等。研究者並在結論中將李喬的創作分為摸索期、豐收期、轉向期、沈澱期、反省期、活躍期6個時期。

研究者認為「反抗」是李喬創作中非常重要的主題，其反抗書寫自成一家，表現出對生命與國家社會的關懷。人的生存即是存在一個反抗結構中，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痛苦，人無法完全解除痛苦的狀態，只能透過不斷的反抗來獲得短暫的平衡。從社會關係的層面來說，反抗作為一種政治實踐以及追尋主體性的理念基礎，必須落實在人的反抗意念與行動上，李喬就是透過建構他的文學世界來實踐這種反抗哲學。

在歷史書寫方面，李喬閱讀大量歷史檔案，並實地進行田野調查，以自身的角度再次重新詮釋，並將重點放在背後所延伸來的意義。李喬以自身的想像填補真實歷史的空隙，重構心中想像的歷史，展示殖民之後的歷史思考與自身的生命觀和歷史觀。

李喬的文學思想以文化根植於土地為基礎，說明土地與主體性的結合。在許多作品中試圖喚醒共同的台灣記憶，呈現出命運共同體的觀念，並把母親與土地的意象相互連結，建立台灣主體性的概念。在寫作技巧方面，李喬嘗試著以不同的手法表現不同題材的創作，並且展現了多元的書寫語言以及獨特的書寫風格。他將台灣社會的脈動表現在創作之中，並將視野拓展到社會的每個角落，對台灣文學有卓越的貢獻與影響力。

媽祖故事與媽祖文化研究

楊淑雅，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金榮華

本論文主要以媽祖的故事為主軸，探究故事對媽祖文學及媽祖文化的影響。媽祖傳說故事在華人圈流傳已久，媽祖信仰貼近百姓的生活，媽祖文化對民間社會影響甚大，其相關的文獻資料亦相當豐沛，具有相當的研究價值。

本論文首先探討古今文獻的媽祖生平與歷代封祀。其次探討媽祖故事的分類，研究者將媽祖的故事分為四種類，分別為媽祖救難解厄的故事、媽祖建護廟宇的故事、媽祖收伏神魔的故事及媽祖與其他神祇互動的故事，說明故事的特色及其廣為流傳之後對社會及百姓的影響與價值。第三，本論文探索

媽祖傳說故事的特性與流傳地區，主要探討媽祖傳說故事歷經歷代官方的重視與宣揚，加上民間廣為流傳產生之區域性，研究者區分為宗教性、政治性及區域性三種特性加以論述。第四，分析媽祖信仰所形成的媽祖文化，探討媽祖信仰因中國朝代遞嬗及環境的變遷而產生遷移的情況，研究者認為因為人民的遷徙，媽祖信仰得以傳播到世界各地。第五，審視媽祖文化影響下的文學與藝術，如媽祖為主角的小說、戲曲、舞蹈、電影動畫等文學與藝術作品等。第六，整理媽祖文化與民俗活動，以三大媽祖廟為例，探討媽祖廟的歲時祭儀、廟會活動型態，以及廟會形成的相關產物。最後，研究者耙梳媽祖文化與現代社會的關聯，主要探討媽祖文化受現代社會環境變遷的影響所產生的改變，分別衍生出現代管理、社會事業、公益活動及旅遊觀光等諸多嶄新的面向。

激越與戰慄：台南地區的文化發展——以龍瑛宗、葉石濤、吳新榮、莊松林為例（1937-1949）

陳祈伍，中國文化大學史學所

指導教授尹章義

本論文以1945年為分界點，分析光復前後龍瑛宗、葉石濤、吳新榮以及莊松林4人不同的發展，考察台南地區在政治、文化轉折之時所表現出來的文化活動內容。並以他們為代表，呈現出時代轉變時，台灣知識分子必須在短時間內面臨的國籍、文化等重大認同課題。研究者認為這些知識分子的精神心靈史，就是台灣歷史的縮影。

台南地區在光復前後曾在文學上蓬勃

發展。日治時期，龍瑛宗、葉石濤、吳新榮及莊松林分別活躍於以日本人為主和以台灣人為主的文學團體。光復後，龍瑛宗主導的《中華日報》日文文藝欄展現出戰後的另一股文化氣象，龍瑛宗及葉石濤對於文學有清楚的理念，他們以文學作品和評論豐富台灣文化的內涵，可惜後來一人離開台南，一人身陷牢獄之中。吳新榮和莊松林曾在日治時代從事文獻調查，期盼借用民俗材料寫出重要的文學作品，達成抵殖民的目標，光復後兩人繼續從事民俗文獻的調查。

在光復初期短暫的榮景之後，禁用日文、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等事件，皆對台南文學及文化地位的發展造成莫大的衝擊。年紀較長的龍瑛宗、吳新榮、莊松林在文學創作方面大多停筆，只剩年紀稍輕的葉石濤繼續在文壇奮鬥。因為前述政策及政治的壓抑，使得台南文學走向文獻民俗方向，最終在文學領域失去了全島性的發言機會。但無論如何，台灣本土文學意識的興起，仍然是台南地區文化發展歷程中不可忽視的重要成就。

李炳南《雪廬詩集》及其詩偈之研究

鄭雅芬，中興大學中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林文彬

本論文以李炳南的《雪廬詩集》及其詩偈為研究焦點，研究者認為書中可見作者的史家記實之筆，亦可感詩人比興之意，其詩歌融情、景、事於一片，具「變風、變雅」的特色，頗具詩史的韻味。李炳南生於1890年，卒於1986年，自嘲為逃難專家，在亂世中眼見時局動亂、百姓顛沛流離，寫下二千多首詩歌抒發感受，其詩歌作品不僅善陳時

事，也針砭世道。

李炳南來台後潛心佛學，弘法護教不遺餘力，並運用古典詩學的造詣，寫下許多淨土詩偈。其淨土詩偈是修學淨土念佛法門的心得，研究者認為其中所呈現的終極關懷是「導歸極樂」，所欲表達的重點則是信、願、行。李炳南的詩偈與詩歌作品是藝與道的結合，詩偈中展現出深層的佛心底蘊，作品中對生命終極的宗教探尋不遺餘力。

研究者試圖透過本論文證成李炳南作品之中的史意與佛心，前者具有儒家悲天憫人淑世的胸襟，後者則以佛教作為生命終極的歸宿。儒與佛既是其生命的歷程，也是構成其詩歌作品的兩大部分。論文中依序探討其人生平與著作、詩情史筆、生活雜詠及其詩偈。並期盼透過本研究來說明李炳南在當代台灣佛教界與學術界的特殊意義。

李潼「台灣的兒女」系列作品中的兩性書寫研究

林宜青，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所

指導教授蘇伊文

「少年小說」是針對青少年讀者的年齡、興趣、所關心的事物、能理解的語彙、應該明瞭的道理，所創作出來的小說作品。這樣的作品對於青少年的啟蒙與成長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不僅要符合讀者的身心發展訴求，還須兼顧教育性、文學性與趣味性。本論文以李潼的少年小說「台灣的兒女」系列為本，探討小說中塑造出來的男女形象特質、兩性互動情形、性別角色歸屬以及兩性意識，並且藉此了解作者透過小說所要傳達的人生哲理與生命意涵。

「台灣的兒女」系列小說以「台灣人」為描述對象，以「台灣事」為情節主軸，以「台灣情」為訴求主題，共計16本，時空橫跨1872年至1996年，並獲得最佳少年讀物及性別教育平等優良讀物等獎項的肯定。研究者認為書中所塑造出來的兩性角色大多數都屬於傳統認知中的男性與女性概念，男性較為陽剛，女性較為陰柔，但亦有部分角色具有兩性化特質，即同時具有某些顯著的女性化及男性化的特質。兩性互動方面大抵和諧而互重，細微差異在於小說中的男性尊重女性，女性卻批評男性。整體而言作者的書寫態度及作品中人物的言行表現，都展現出對女性的尊重肯定，呈現兩性平權思想，對於台灣社會對於女性的不平等待遇，也展現關懷與省思。

研究者認為，這套小說明確寫出青少年男女自我認同的過程與自我意識的覺醒，書中角色亦傳遞出樂觀幽默的生活哲學與悲苦不移的生命韌性，能夠成為青少年讀者生活態度與生命價值觀的良好示範。雖然在寫作技巧以及書籍排版仍有侷限及不足之處，但是仍可以從李潼的創作中看出他對兩性議題的重視與努力。

台灣客語勸世文之研究——以〈娘親渡子〉為例

楊寶蓮，台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所

指導教授古國順、鄭榮興

勸世文是台灣客語說唱藝術的重要內容，本論文以〈娘親渡子〉為例，從唱片、文獻與田野調查中，耙梳〈娘親渡子〉的傳承及書寫系統，並對其修辭、襯字、語言風

格、特殊字詞及行腔做韻技巧進行深入的探討，以期對台灣客語勸世文、客語說唱藝術及客家俗文學做出貢獻。

〈娘親渡子〉源自唐、五代敦煌俗講〈佛說父母恩重經講經文〉以及歌讚〈十恩德〉，再傳承於〈懷胎寶卷〉、贛南儀式說唱〈十月懷胎〉，後隨著採茶、八音藝人或道士傳至閩、粵以及台灣。旨在傳達父母恩重以及報恩思想，傳承了中古敦煌十月懷胎、迴乾就濕、三年乳哺、洗濯不淨的育兒風俗，體現客家健婦持家的辛勞，並保留許多古老特殊的詞彙，表現出客家文化的特色。直至今日，楊玉蘭改編自〈娘親渡子〉的〈玉蘭勸世歌〉仍在民間廣為傳唱。

研究者認為〈娘親渡子〉源遠流長，是客語勸世文及說唱藝術的結晶。它具有民間文學自發性、集體性、匿名性、口傳性、變動性、言習性等特質，思想以儒為主，內容在於勸孝，形式輕薄短小，表演方便，因此從古至今能夠持續傳唱不墜，亦能帶動其他客家表演藝術風潮，不僅是敦煌說唱藝術的活化石，同時也是研究客家文化的好素材。

日治時期台灣唱片流行歌之研究——兼論1930年代流行文化與社會

黃裕元，台灣大學歷史學所

指導教授吳密察

本論文考察1930年代日治時期台灣唱片流行歌，探討其發展特色及社會文化意涵。這個時期的台語流行歌曲熱鬧而多元，後來雖因戰事的展開而悄然走下歷史舞台，然而這個時期的創作與演出，不僅奠定台灣近代歌唱文化的基礎，更留下許多珍貴的文化資產。

20世紀之初，唱片業隨著錄音技術的進步而不斷發展，台灣受日本、上海等流行歌市場的刺激與帶動，在1930年代亦開始出現以台語演唱灌錄的唱片歌曲。在形式上以西洋管弦樂伴奏的民謠長歌為始，逐步發展出形式較短、多段歌詞的創作歌曲，配合電影與唱片的宣傳販售，也就是所謂的「流行歌」。

研究者認為，台灣本土流行歌在初期帶有濃厚的都會青年性格，以爵士樂及愛情作為歌曲主題，而後新創短歌的形式逐漸定型，歌詞與音樂內容也逐漸偏向歌仔、南北管與山歌等本土歌樂文化。由於創作習慣不同，唱片歌曲對於社會流動議論的現象與觀念，形成了一套不同於文學與西洋樂界的詮釋慣例，發展出獨特的風格。

在社會文化方面，研究者認為，流行歌顯露出台灣人對「現代」、「摩登」、「毛斷」等新觀念所產生社會現象的矛盾情結，先是以新奇的眼光端視，在狂歡後卻表現出更多的孤寂與疲憊，對快速流動的都會生活表達深刻的無奈與反感。在愛情抒情歌曲當中，雖然自由戀愛的觀念已經深植年輕世代，但從空洞的男女互動描述中可以看出，自由戀愛不過是流行文藝家們編織的綺麗夢想。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1920年代以來政治運動者標舉的台灣群體認同，以及扮演亞細亞的和平關鍵角色等主張，雖在1930年代的唱片界得到呼應，可惜在中日兩國全面開戰後，台灣本土流行歌並對此未做出太大的反應，面臨時局的變化，自陳要促進日華親善的台灣人也只能無言地旁觀。第一代的台灣流行歌，也就在戰爭的夾擊中走下歷史的舞台。

主體浮現：台灣現代海洋文學的發展

李友煌，成功大學台灣文學所

指導教授呂興昌

本論文的目的在於釐清現代海洋文學如何再現島嶼的海洋、土地與人民。台灣現代海洋文學歷經90年的發展，成為台灣主體意識重要的論述象徵。海洋作為一種地理的、物質的客體，吸納、凝聚島嶼人民投射的個人與群體情感。在島、岸與海的特殊自然空間裡，海洋影響島嶼土地與人民，形成特殊的海洋文化。移民與殖民歷史，更形塑島嶼混雜多樣的文化，涵養人民獨特的主體內涵。

本論文以時間作為區隔，將海洋文學的發展與台灣主體意識的演變作一參照，區分出1920~1945年代台灣主體意識萌芽、1945~1960年代台灣主體性的抹殺與沉潛、1960~1970年代台灣主體性的再出發、1980年代台灣主體內涵的深化、1990年代以降台灣主體的確立與挑戰。由於殖民海禁海防隔離了人與海洋，一直到90年代社會風氣轉變，海洋本身才漸漸獲得重視。具內在價值及系統價值的海洋生態在環境倫理的實踐中，從他者、客體高抬為主體，脫離被人類宰制的命運。海洋的開放特質同時鼓舞人心走出封閉的島嶼視野，並以此作為新時代象徵，將海洋精神納入主體內涵，「海洋台灣」遂成為更具獨特性的主體。

研究者認為此一政治的、國族的主體，乃是建構在前述海洋文化內涵、海洋空間、個體及群體主體性的基礎上。在主體浮現的同時，海洋生態面臨海洋經濟開發的威脅，海洋台灣亦面臨遭到海洋中國吸納的危機，台灣的未來也將持續透過海洋文學再現。

日治時期台灣知識份子對於「世界主義」的實踐：以基督教受容為中心

鄧慧恩，成功大學台灣文學所

指導教授呂興昌

研究者認為日治時期的台灣知識份子主要透過日本、西方與中國這三種途徑來理解世界。本論文從世界主義的實踐切入，分別審視受到日本、西方與中國影響，並且接受基督教的日治時期台灣知識份子，進一步分析整理他們的文化活動與社會參與。透過前述探討，以期能夠探究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的心靈、世界觀與國族認同。

日本部分以周再錫為主要研究對象。他出身台灣早期基督教家庭，在面對日治初期台灣現代化的轉變、新式教育的引進以及嶄新世界觀的建立，其應對的態度是本論文研究的焦點。順此，無教會主義曾在日治時期風靡於留日學生與台灣本島，許多基督教知識分子深受影響，其精神內涵以及在台灣擴展的情形亦是本論文關注的重點。

受西方觀點影響的知識分子則以陳清中以及林攀龍為主要研究對象。本論文探討陳清中在留學返台後，如何落實留學時領受的西方文學以及社會改革。並分析林攀龍的《人生隨筆》，對其文學與思想內容進行詮釋，文中亦對「一新會」的設立過程和推行重點進行討論。

中國部分以黃呈聰、謝萬安、須田清基為主要研究對象。分析真耶穌教會的基督教信仰，對他們三人的作品、社會參與以及世界語推行運動的影響。其中須田清基的入信，代表著信仰無分國界與種族，他對台灣的理解與付出，以及對真理追求的態度，皆

具有相當的時代意義。從這一系列的探究，可以幫助當代的研究者更加清晰地掌握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的心靈世界與活動狀況，提供後續研究更為豐富的參考資料。

台灣閩南疾病諺語的文化詮釋——以醫／病關係為研究視角

許蓓苓，東吳大學中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林明德

疾病的定義與詮釋往往受到文化與習俗的影響，包括病因的解釋、相關的病痛、症狀的陳述，以及正常／異常的判斷，都和文化息息相關。在口傳文學中，諺語和相應的文化具有緊密的關係，能夠表現語言的功能與特色，是文化研究中相當重要的主題。有鑑於此，本論文嘗試從文化詮釋的角度，探討與疾病以及醫療有關的台灣閩南諺語。

諺語／文化／疾病三者可以相互反映與詮釋，透過諺語呈現疾病文化，也從諺語看見文化是如何形塑疾病、如何醫治疾病。醫學上所稱的「疾病」，是一個生物過程，指得是「個人的身體產生缺陷、器官機能異常、身體的生理狀態不平衡」。因此包括病名、病徵、病因、病患、病情以及心理狀態的異常等，皆是本論文取材的範圍。除了直接闡述疾病議題的諺語外，本論文不侷限於醫療上的疾病定義，任何能決定個人生活態度的元素，都會對其疾病傾向發揮巨大的影響，因此也都是本文關注的焦點。

這些疾病相關的諺語，直接或間接架構起台灣社會的疾病文化。「文化」不單只是某一個族群精神與物質文明的總稱，更是能夠加以解釋分析的「語言」，諺語就是能夠

提供文化研究的語言文本。台灣閩南疾病諺語代表的是台灣閩南族群面對疾病以及相關問題時的應對，其中包括定義問題的方式、解決問題的知識體系，以及面對問題時的生命情調。

本論文將依序討論台灣疾病諺語的醫療環境與醫療體系；疾病、信仰與民俗醫療；疾病文化的身體意涵；疾病與醫療的社會闡釋；疾病、飲食與養生文化。期盼透過這些研究，能夠對相關文化有更深入的認識。

洪棄生的旅遊文學——《八州遊記》研究

程玉鳳，東海大學中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吳福助

本論文主要研究洪棄生的旅遊文學作品——《八州遊記》，並希望藉此將台灣古典文學的研究題材拓展至新的旅遊文學領域。洪棄生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與祖國情懷，於大正11年（1922）9月6日（壬戌7月15日）前往嚮往已久的中國大陸遊覽，足蹤遍及十省，返家後始撰寫《八州遊記》、《八州詩草》。其中《八州遊記》以日記體寫成，內容豐富，包括自然景觀描述、人文景觀記述、文史地理考據、感慨議論抒發等，長達21萬餘字。

研究者先簡介洪棄生的生平及其旅遊文學作品，然後探討其「壯遊中華八州」的動機、目的與收穫（親睹壯麗風物、會友交友、驗證所讀、得江山助增文章奇氣）；之後獨立一章討論《八州遊記》的體式與版本，將所蒐集的6種版本進行分析比較；對於遊記的內容，則分由描摹自然景觀、記述人文景觀、考實述異與辯駁正偽、抒發感慨議

論四面向進行詳細分析；研究者並指出洪棄生的遊記寫作自然流露出對台灣的鄉土之愛與濃厚的祖國情懷，在這當中並無所謂身份認同焦慮問題；之後歸納分析《八州遊記》的寫作方法，其中將景點或時間相互比較的「對照比較法」，前人遊記並不多見，而引證詩文典故和考查古代典籍則為洪氏強項，他並重視地理形勢與數據紀錄；由於《八州詩草》與《八州遊記》為同時而體裁不同之作，因此另立一章將二書參酌比較，以使洪氏遊歷大陸的整體面貌更加清晰，並說明兩書之間互補的密切關係。最後由《八州遊記》探討洪棄生的思想與人格特質，歸納出他的人道主義與反戰思想、科學求真精神、雅俗觀，並呈現出他幽默隨遇而安且喜好臧否人物的性格面貌。

駱香林：儒家型知識分子研究

黃憲作，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所

指導教授顏崑陽

所謂「儒家型知識分子」係指中國傳統帝國獨尊儒術以來，掌握知識、承擔道統與政統延續的代表，是中國傳統社會倫常與道德的代言人。儒家型知識分子常侷限於意識型態而代表上層社會，向下層社會灌輸與傳播意識型態，自覺或不自覺的為當權者建立文化霸權。本論文綜合駱香林的思想與行動，將其歸類為儒家型知識分子。

駱香林生於1895年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因其遺民意識使然，堅持成為漢文化的傳播者，以書房與詩社作為文化抵抗的場域，深受花蓮民眾尊崇。終戰後，二二八事件造成許多台灣人的祖國夢破滅，進而促成台灣意

識覺醒。駱香林在此時出面擔任「中國化」的協力者，竭力於中國傳統文化的重建，建構統治合法性與正當性的文化霸權。他擔任《花蓮縣志》的總編纂，協助《台灣省通志》〈名勝古蹟〉的供稿與攝影，透過地方歷史的想像與建構，從遠古的中國歷史溯源，強調漢人在此地的活動，並淡化各種差異，建構中國化的國族認同。

隨著現代化的開展，物質文明在無形中傳播影響力，逐漸改變傳統的價值觀，駱香林對現代化的態度也逐漸發生轉變。早期他對工業化充滿肯定與期許，後來轉而趨於保守，感慨傳統倫常在西化後淪喪，對儒學在現代社會被邊緣化充滿無奈，在其詩作中可以看出這些轉變。

研究者認為，駱香林的矛盾之處在於他所堅持的傳統中國文化路線，與工業生產以及資本主義緊密結合的現代國家型態產生相當程度的落差。而根據儒家型知識分子肯定集體主義的邏輯，在國家與個人之間，儒家型知識分子只能選擇犧牲個人而成就國家。順此，若儒家型知識分子依舊將自己定位在上層結構，協助當權者教化百姓及維護文化霸權，則永遠只能屬於依附型的知識份子，無法獨立於體制之外，這也是現代儒家型知識分子應該深刻思考的問題。

想像的系譜——清代台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建構

余育婷，政治大學中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黃美娥

本論文旨在建構1683年清廷領台至1895年乙未割台期間台灣古典詩歌的知識系譜。

研究對象以台灣本土文人為主，從「詩歌知識論」的角度出發，審視清代台灣文人如何認識詩、如何寫詩、如何評賞詩，從詩歌的本質、功用、創作、審美等面向，考察清代台灣詩歌生成的歷程。

學校教育的知識養成、方志藝文志所形塑的集體文學觀、以及宦遊詩歌入台後所奠定的書寫模式，三方相互交錯、辯證，而詩歌典律也就在此權力／知識的網絡中應運而生。清代台灣的詩歌，仍處於初步發展的起始階段，這時的台灣文人对詩歌本質的認識，仍有許多矛盾、模稜的空間，創作觀念並無具體的詩法主張。詩歌知識系譜的建構，不只是為了瞭解清代台灣古典詩的面貌，更為了確立清代台灣詩歌發展在台灣文學史上的位置。

在清帝國有秩序地推動文教建設下，台灣文人如何將來自中國的文學知識轉化成自我的範疇，並安置在台灣古典詩歌體系中，呈現屬於台灣的詩歌知識系譜，均是本論文關注的重點。尋此脈絡，研究者開展出「詩歌知識的移植與傳播」、「詩歌體用論」、「詩歌創作論」、「詩歌審美論」四個章節，論述文化／文學的傳播促進「體用論」的形塑，而「體用論」又促進「創作論」的產生，最後「創作論」又影響「審美論」的形成，台灣古典詩的獨特性、連續性與發展性也因之顯現。

跨界交會與文化「番」譯——海洋視域下台灣原住民記述研究（1858-1912）

陳芷凡，政治大學中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孫大川

現今台灣古典文學研究中，台灣原住民形象的論述，往往側重於清廷的話語霸權，從帝國的角度來看待邊疆民族。研究者希望透過探討前述不同視域的交會與碰撞，擴大相關研究的邊界，跨界思考同一歷史情境底下，歐美與日本對東亞秩序的關切與影響

本論文嘗試從海洋視域探討1858年至1912年間，台灣原住民的形象再現、歷史情境與文化詮釋。各自耙梳清廷、歐美、日本三種視域再現台灣原住民的觀點，審視不同層次的觀點流動，諸如清朝17、18世紀與19世紀中葉漢番論述的變化，以及晚清治台與歐美列強、日本海權思想的互動與微妙張力。

1858年清帝國簽訂天津條約，台灣開埠，西方與日本以物產、傳教、踏查為名，順著海路，聚集台灣。這些經由海洋而來的海外勢力，與清帝政府思考台灣後山番地、開山撫番、設省等政策，形成多層次的拮抗與論辯，台灣原住民於此成為各方勢力斡旋與角逐的籌碼。從台灣進入歷史時代至今，原住民形象／異己面貌的再現仍未停止，對於這些刻板印象的反思亦是本論文關懷的重點。

戰後台灣對原住民的既定思維，或可思考日治時期體質人類學的發展，並上溯至清帝國的華夷之別，不同時代與不同作者雖各有其關注焦點，然而原住民印象卻存在某些跨時代的相似思維。面貌的差異僅是表象，數個文化概念的衝撞與交會，方為論述異己形象的重點。本篇論文從海洋視域觀察台灣原住民的記述文獻，作為這種思考的驗證與延伸，並期待更多不同向度的文化交會與對話。

多重認同困境與台灣文學——以吳濁流與王幼華為例

黃信洋，政治大學社會學所

指導教授顧忠華

本論文嘗試釐清多重認同的理論意涵，並以吳濁流及王幼華兩位客家作家為例，說明這兩位作家作品之中所呈現的多重認同觀點，以及多重認同概念對台灣社會的重要性。

研究者認為吳濁流在《亞細亞的孤兒》中已經蘊含了多重認同的想法，並在隨後的《無花果》以及《台灣連翹》中提出了類似民主化的論點，期望不同的族群可以藉由認同台灣來解決認同歧異性的問題。解嚴後崛起的小說家王幼華更是表明自身早已具備多重認同的思維，在他的長篇小說《廣澤地》以及《土地與靈魂》中皆體現了多重認同的概念。

對吳濁流來說，族群認同不應構成國家認同的障礙，人民應該秉持民主的精神，共同為台灣的發展而努力，不同族群之間的多重認同，應該也可以是促成台灣進一步民主深化的要素。對王幼華來說，若是肯定多元文化的發展將有助於台灣民主的深化，則多重認同的概念有將有助於民主化的進展。

研究者認為台灣的民主制度保障了多元文化論述的眾聲喧嘩，無論中國民族主義者以及台灣民族主義者，都在這套制度下獲得保障，而這種制度便是台灣人的政治認同與國家認同。在這個狀況下，唯有成為一個尊重差異的「民主公民」，台灣的族群藩籬才會消失。公民社會不僅可以保障主體之間的多元共存，更能形塑共識，促進族群和諧的可能性。

清代台灣儒學詩研究

洪素香，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林文欽

本論文以清代在台灣實施儒學教育始末作為背景，透過當時被清廷調派來台負責教育工作之宦台儒官以及台灣本土儒師的詩作，檢視清廷在台灣實施儒學教育的情況與利弊得失。研究者將這類與儒學教育相關的詩作稱為「儒學詩」。

回顧清代台灣儒學詩，其歷史價值在於它真實反映清廷在台灣施行儒學教化的過程與樣貌，可以彌補史料之空缺；其文學價值則展現在這些儒學詩的聲韻格律、修辭技巧，以及表現出儒家精神的詩作內涵。由於這些儒學詩的創作者，無論是宦台儒官，或者台灣本土儒師，皆是一時菁英，對於當時的社會具有示範及引領作用，亦是教育台灣本土士子以及在日治時期延續文化傳承重要的力量。

研究者認為清政府在台灣施行儒學教育，將儒學思想輸入台灣以教化百姓，其功在於使台灣因此步入知識文明時代；其過則是在教化過程中，無視台灣多元種族之差異，將儒學思想加諸於不同種族身上，致使台灣人民高度漢化，無論在生活型態、行為表現，或者思想模式，皆成為與中國相同的複製品。而儒學的影響並沒有隨著台灣割讓日本而結束，反而在日治時期成為對抗日本統治壓力時，一股慰藉人心的精神支撐力量。直到現在，台灣不管在學校教育、社會教育，或是家庭教育中，仍然以儒學教育為主。

清代台灣詩之海洋書寫研究（1683-1840）

陳思穎，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林文欽

描寫海洋及一切與海洋相關的作品皆屬於廣義的「海洋文學」，包含描寫海洋的自然風景、人類活動、作者感受以及蘊涵於各種海洋意象中的情感皆屬之。本論文以1683年台灣納入清朝版圖為始，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為終，探討這段期間台灣古典詩作的海洋書寫。

這個時期台灣本土文人尚未大量崛起，宦遊詩人來台以欣賞異地風景或蒐奇志怪為主。由於帝國思想封建之故，此時的台灣海洋詩以自然書寫為主，對人文海洋的關注較少。渡海詩、宦遊詠海物詩、八景詩以及竹枝詞，皆累積了相當可觀的詩作。依據內容可以區分出四大意識，分別是神仙意識、懷鄉意識、中國文化思考及宣揚清威意識。神仙意識可以窺見當時詩人對海洋豐富有趣的想像；懷鄉意識能夠發現宦遊文人與本地文人之間對台灣認同感的差別；中國文化思考及宣揚清威意識則能顯現詩作中的情感投射及政治意涵，凸顯帝國中心與邊陲島嶼之間的差別。

相較於明末及明鄭時期，清朝領台後，大批官員渡海來台，台灣本地文人也逐漸興起，台灣海洋書寫的內容更加豐富多元，也呈現出這個時代特有的海洋文藝特色。研究者認為，要選出這個時期台灣海洋詩壇的代表詩人及作品，不僅要考量創作的多寡，更要注重題材之多元、文字的可讀性及詩作獨特的價值。其中宦遊詩人孫元衡、錢琦、朱

仕玠、胡健、周凱，及本地文人卓肇昌，以上6人的海洋詩各有巧妙之處，都是這個時期優秀的海洋詩家。

台灣殖民文化及其歌謠書寫研究：以女性、平埔族為論述主軸

楊克隆，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林文欽、莊萬壽

本論文以女性與平埔族的受殖現象為論述主軸，企圖建構並印證台灣歌謠與殖民文化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傳統舊志文獻向來較為缺乏對於底層群眾內心世界的探討及刻劃，所透露的弱勢者訊息，都是被動經由權力者所選取、書寫及定義，弱勢者是無聲的「客體」。相對於舊志文獻，歌謠更能精確傳達底層群眾的喜怒哀樂、痛苦願望與心聲，歌謠不僅具有民間文學的價值，更是建構台灣庶民生活史的重要史料，當庶民社會史料極度缺乏，歌謠便成為研究底層群眾心靈世界的重要資料。

研究者對歌謠文本以及舊志文獻進行耙梳，透過兩者相互參證期達成更完備的歸納分析。針對歌謠文本、舊志文獻互通之處，透過「以謠證史」、「以史解謠」來達到「謠、史互證」的功效。針對歌謠文本、舊志文獻歧異之處，進一步「以謠疑史」，尋求更可靠的證據。針對僅有歌謠傳唱、舊志文獻卻缺乏記載之處，亦可達到「以謠補史」的研究價值，補充正統官方舊志文獻的不足之處。透過以上研究分析，以利破解父權制度對女性，以及漢人社會對平埔族的污名化，並藉以重新發現女性以及平埔族受殖時期的心靈寫照。

本論文主要探討台灣漢人社會的父權體制與種族主義，是如何透過經濟殖民以及思想殖民的過程，來完成對女性、平埔族的普遍支配，並得以遂行一連串經濟剝削、思想馴化的殖民行為。其次並分論女性歌謠和平埔族歌謠所呈現各類型之受殖文化內涵，並據以釐清台灣殖民文化之特色及演進過程。

台灣內台歌仔戲定型劇本的語言研究 ——以拱樂社劇本為例

劉南芳，清華大學中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王安祈、蔡英俊

50年代台灣的歌仔戲班出現定型劇本，代表著歌仔戲由口傳的「活戲」到「定型書寫」、從即興集體創作的「口頭文學」逐步過渡到作家的「書面文學」。本論文以現存的內台歌仔戲劇本為基礎，透過分析唱詞及道白，討論其台語書寫特色、敘事結構和人物情節佈局，進而瞭解內台歌仔戲的演出生態及其獨特的審美觀念。

在內台歌仔戲定型劇本的產生背景方面，研究者描述了由「活戲」到「定型戲」的發展過程，並指出這些劇本中「連台本戲」多而「孤本戲」少、「新編戲」多而傳統戲少，這是受到海派京劇在台發展所影響。

而內台定型劇本大部分以台語書寫，由於屬「工作本」性質，故以「讀音」、「實用性」為主要考量，而不講究中文書寫上的「正確性」。在本章中研究者討論了劇本中「語文合一」的特色、標記方言的必要性，並比較不同作家之用字。

內台定型劇本中的戲劇語言豐富多變，除「四句聯」的規律外，還發展出八言、

九言等詞格；而劇本在「鬻門白」及「新劇式」的道白上也有長足發展，並開拓了新詩式的戲劇語言。在唱詞與道白的選擇上，道白篇幅遠勝於唱詞，地位十分重要。

最後研究者概敘內台定型劇本的敘事特色，包括人物、情節的構成與分布、旁白與敘事時間的轉換、「套路」的使用，以及內台歌仔戲結構上的潛在規律。

意識的表述：楊牧詩作中的生命時間意涵 劉益州，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

指導教授鄭慧如

本論文選定「詩」與「時間」作為研究範圍，並考量楊牧在文學創作上長期經營「生命時間意識」的表述，其詩作質量俱佳，相關的研究資源較為豐沛，故以楊牧已出版的詩集作為討論文本，希望藉由楊牧詩作中所呈現的生命時間意涵，釐清生命主體和語言表述在文學作品中的具體關係。

研究者認為，作者透過作品所表達的，不僅是現實中具體事物的再現，更包含了非現實事物的表象和再現，文學作品的形成過程中就已有作者主體意識的參與，意向主體的意識透過文學作品的語言表現出來，而詩作恰是能夠凸顯意識與表述的文類。

時間是生命主體的基本界域之一，時間較為抽象而且與存有的關係密切，人的意識與表述都與時間相涉，加以楊牧在這個主題上的關切，透過對時間的討論，將能闡明存有的意識與表述意涵之間呈現出來的關係。

循此，研究者依序探討生命主體意識對「身體」的時間意識觀察，進一步分析楊牧詩作在感受的瞬間所進行的表述。其次，

研究者探討生命主體意識如何跳脫身體當下存有的時間流，對歷史時間進行意向活動並進行表述，並討論楊牧詩中的死亡想像與超越，最後探討時間的意識表述以及想像與指涉。透過前述討論，研究者釐清「存有」、「時間意識」和「表述」之間的關係，並歸納出楊牧詩作中的生命時間意涵，期盼透過深入領會創作者的意識活動，來更接近創作的本源。

清代台灣文獻中所反映的疾病經驗與文化想像

郭侑欣，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指導教授林明德

本論文以清代的台灣文獻為基礎，探討中國傳統的醫學視域下，以瘴癘為中心所擴大的疾病經驗與文化想像，並考察清代台灣如何被納入中國南方醫學的一環，以及中國醫學文化在台灣傳播與變遷的軌跡。瘴癘是中國對南方風土病的統稱，是生物學與環境論述、歷史修辭、文學語境、也是醫學術語，既是中華帝國南方論述的核心，也是文化符碼，從疾病投射為對國族的隱喻，用以描述異文化。

台灣被納入清帝國版圖後，醫學文化深受漢人影響，延續了對南方水土表述的傳統，以炎方瘴海來形容台灣炎熱潮溼的氣候與帝國邊陲的地理位置。知識階級在醫學典籍與方書裡尋求自我療癒，底層的民眾則信巫好鬼。台灣開放為通商口岸後，雖有傳教醫療和海關醫員的進駐，但並未改變大部分台灣人的就醫習慣，生病時仍以求助中醫為主，絕少求助於西醫。

由瘴癘醫學所衍生的衛生保健觀以及補養文化，被漢人移民發揮到極致，甚至產生了駭人聽聞醫療行為，以原住民的肉和骨髓作為醫治各種疾病的特效藥，而人肉入藥不單只是台灣人的迷信而已，在中藥典籍裡也可以找到相關的記載，再次驗證了中國醫學文化對台灣的疾病觀念與醫療方式深刻的影響。

文本記載的疾病經驗，扮演了傳播台灣瘴癘負面形象最關鍵的角色。這些記載進一步型塑了南方的卑濕、高溫與不利人居，也成為貶謫文學中常見的焦慮、恐懼與懲罰的符碼，更是社會與文化建構的重要記憶。瘴癘作為一種疾病的表述，實則隱喻了對於熱帶氣候的未知、恐懼、以及對於蠻夷異族的歧視和想像。即便到了清末，雖然台灣的瘴區已經大幅減少，台灣的宦遊文人對瘴癘的描述仍與清初相去不遠，足以見得疾病經驗與文化想像影響之深刻。